

00010

哲学与改革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哲学与改革

林京耀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许文锋 刘纯

封面设计：张红风

哲学与改革

Zhexue Yu Gaige

林京耀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0 ·字数230,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919

统一书号：2093·72

定价：2.70元

ISBN 7-207-00163-0/B·6

序

这本文集里的文章，除了少数几篇以外，都是1983年12月以后写的，其中有几篇没有发表过。

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象我们这样一个尚未摆脱贫穷落后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更为艰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制定和贯彻执行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已经和正在改变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改革、开放需要人们转变观念，并且已经和正在促进人们观念的转变。在宏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人们在思考。理论工作者在思考，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作出理论的说明。这本文集反映了笔者所作的思考的初步结果，疏漏、甚至错误在所难免。因此，读者的批评，正是笔者所期待的。

本书有的文章是分别与陈荷清、郝怀明、陈远同志合作写成的。

作者

1986年12月20日

目 录

序

人道主义：历史和现实问题的重新提出	1
我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看法	43
认识新鲜事物 创造新鲜事物	52
正确的思想路线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57
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81
改革中的哲学和哲学教学的改革	97
现代哲学的基本功能	99
改革中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102
端正思想方法，深入搞好改革	127
大力促进智力开发，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	130
我国历史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对今天哲学发展 的影响	144
成人教育与两个文明建设	172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179
一切着眼于建设	185
教育科学文化是提高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	194
发展商品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	202
正确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	214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要着重在制度上进行改革	236
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244

从根本上改变僵化的经济模式	254
与改变传统经济模式有关的一般理论问题	264
农村改革的伟大成功和对城市改革的要求	275
不能用传统的思想理论观念来解释《决定》	284
改革需要首尾一贯的理论指导	286
冲破自然经济构筑的壁垒	289
 要学习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292
改变传统的理论学习模式	294
针对新的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	295
实践的发展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前进	299
迎接新的挑战	
——谈谈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	306

人道主义：历史和现实 问题的重新提出※

建国以来，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曾不止一次地被提出来研究和讨论，但都未能深入地进行。主要是因为“左”的思想影响下，它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只能是批判、打倒的对象，不容许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对谈人性、人道主义的同志和他们的论著，一律扣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帽子，态度粗暴，这是应该彻底否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一方面残酷地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罪恶勾当；一方面大批人性论、人道主义，把人性论、人道主义统统看作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同义语，是什么“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似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是不讲人性、人道主义的，而他们的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行径反而是革命的，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林彪、江青一伙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是同他们所实行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联系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在理论上的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性、人道主义问题重新被提出研究和讨论了，涉及内容之广泛（几乎涉及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发表的文章、著作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社会

※ 郭怀明同志是这篇文章初稿、二稿的合作者。

思潮，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引起理论界、文艺界这样广泛的关心和重视，这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党和国家，对我们的人民，都是严重的灾难，革命的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一切爱国的、正直的人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折磨。在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暴行的过程中，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怎样才能使“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件不再重演，人们根据各自的出身、经历、职业以及文化水平、理论修养，思考和消化“文化大革命”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人性、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重新提出来的。可以说，人性论、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的重新提出，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宣传，这是对“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的理论上和哲学上的思考。我们对这个研究和讨论的评价，不能离开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

由于在理论上几经反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几年来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通过研究和讨论，澄清了一些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如关于人的社会性、阶级性问题，否定了过去那种认为人性即社会性，社会性即阶级性的简单化的观点，这是完全必要的，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相联系，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其次，揭露了林彪、江青一伙侵犯人格尊严、灭绝人性的封建法西斯暴行。因此，我们可以说，几年来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是理论上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拨乱反正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通过研究和讨论，引起了人们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注意和重视，吸引一些同志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研究和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由于长期缺乏深入的、充分的研

究和讨论，当代外国学术界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情况、他们所提供的材料和观点，我们一直缺乏系统的介绍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外国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关于“人”的研究被陆续地介绍进来了，他们的著作也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了，这对打开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想，是很有必要的。这项工作还刚刚开始，就出现了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不同理解，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也是完全正常的。我们阅读和初步研究了这几年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论著和一些文艺作品，其中有些观点我们赞成，有些观点我们认为值得商榷。由于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哲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同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的现实问题。对这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我们本着弄清问题的精神实质，着重谈谈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的关系。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人道主义的历史作用

“人道主义”这个词是从拉丁文“humanismus”翻译过来的，也可以译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当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后两种译法的时候，一般是有所侧重的。如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运动时，一般译作“人文主义”，谈到费尔巴哈的哲学时，一般译作“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包含的意义比较宽泛，可以是文化的，也可以是哲学的、政治的以至具体的政策等。在这次讨论中，一些同志是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人道主义”这个词的，这同讨论中所涉及到的内容是相符合的。“人道主义”，如果要给它一个简明的定义的话，就是关于“人”的学说，它主张以“人”为

中心，以“人”为本。所以，把关心人、尊重人、承认人的尊严，用一句话来说，把人当作人来看待，规定为人道主义的一般涵义，这是可以的。按照唯物辩证法，一般只存在于个别之中。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了一定的时代、阶级背景，来谈论一般的人道主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①作为一种具有广泛而又深远影响的思想体系，人道主义也是适应时代需要而形成和发展的。人道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旗帜，它是适应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的先驱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莫尔等人，针对中世纪的宗教制度和神权统治，提出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享受现世生活的幸福是人的权利，要求个性的自由和解放是人的天性。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争脱中世纪迷信和愚昧的精神枷锁，蔑视教会神学的权威，赞美自然，颂扬人的智慧和勇敢。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的先驱用人性对抗神性，用人权对抗神权，冲破了中世纪天主教世界观的严重束缚，使人们在黑暗中看到最光辉煌的东西。他们所提出的新的世界观，促进了文学艺术以及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启发了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者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发展为完备的思想体系，明确地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为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锐利的思想理论武器。他们认为，按照自然法或自然的秩序看来，人都是平等的，人生来自由；他们主张废除封建贵族和僧侣的特权，废除封建专制政体，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

从历史上看，人道主义并不是古已有之的思想体系，它并不是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一根红线，而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具体地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它的经济力量的不断膨胀，要求打破限制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封建壁垒，要求劳动力的自由买卖，要求有与它的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文艺复兴运动和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正是在意识形态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以及劳动人民摆脱封建专制统治的要求。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人道主义者认为人类原来的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人具有处理他的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这是按照自然法所赋予的权利，因此，任何人都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显然，这是对英国资产阶级所获取的经济、政治利益的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特别是在存在至今的这些关系中，一个阶级总是占着统治地位；个人的生活条件总是和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相一致；因而任何一个新兴的阶级的实际任务，在这一阶级的每一个人看来都不能不是共同任务；每个阶级都只有一切阶级的个人从那些至今仍然套在他们头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地推翻自己面前的统治阶级，——正是在上述情况下，把争取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个人的任务说成是全人类的任务，是非常必要的。”^①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总是把人道主义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说成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

我们说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创立的思想体系，同肯定人道主义的历史作用和一定的现实意义，这并不矛盾。在历史上，资产阶级曾经是非常革命的阶级，它曾经带领第三等级的群众，战胜了中世纪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以蔑视理性为特征的封建愚昧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7页。

及其他意识形态，把人类历史由封建社会推进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人道主义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它不仅吸引了这个阶级的成员，而且也吸引了渴望从封建专制枷锁和教会神学统治下的无知解放出来的人民群众。所以，人道主义在历史上也曾经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它促进了旧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对于人道主义的这个历史评价，是符合历史的辩证法的。过去我们有些同志认为，人道主义的作用到此就寿终正寝了，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全面确立，人道主义就失去其任何积极作用，再提倡人道主义，就只能起粉饰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反动作用。这种认识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完全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这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人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旗帜，它当然受到时代、阶级的局限，它不会成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启发工具，更不可能用它从根本上去动摇和破坏资本主义制度。但在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后，也并不是凡是提倡人道主义都只起反动的作用。对这个问题要根据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人道主义的具体内容，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德国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要求，运用不同的形式来宣扬人道主义的。康德用抽象的形式来表达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提出“人是目的”这个命题。他说：“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因此，无论人的行为是对自己的或是对其他有理性者，在他的一切行为上，总是把人认为目的。……我们把有理性者称为人，因为他的本性就证明他就是目的，不能只当作工具。人既然是应受尊重的对象，所以一切对他的任意处理就受某种限制。个人并不是单单主观的目的，不是因

为他是我们行动的结果，它的存在才对我们有价值的目的；人乃是客观的目的，那就是说，他的存在即是目的，没有什么其他只用它做工具的目的可以代替它；否则宇宙间绝不会有具有绝对价值的事物了。”^①就是说，人的行为，应该把每个人都当作本身即是目的来看待，而不应该只当作那一个人的意志的工具。康德认为他的这个主张是符合人的本性的。这个时期的一些思想家或者是以文艺作品的形式，或者是以文艺评论的形式，主张以人权、人的尊严、人类之爱为内容的人道主义，有的则用精神自由来解释人道主义，有的则用民主主义来解释人道主义。虽然这个时期的德国思想家用很不相同的内容和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有的还直言不讳地赞扬法国大革命，希望这种革命也在德国发生；但一般来说，他们又是受抽象的普遍的人性论的限制，主张人道是人类永久的目标，他们不赞成封建专制，而又对法国大革命怀有一种恐惧的心理，以为可以通过思想自由而达到政治自由。上述这些人道主义思想，反映了正在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德国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的革命要求和动摇性。所以，与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相比，上述德国思想家们宣扬的人道主义，即使在反封建的意义上，其战斗性就差多了。

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以前最后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他也是个人道主义者，他的人本主义也即是人道主义。费尔巴哈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思想。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指出，“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他说：“宗教认为是第一性的东西——上帝——，我们已经证明，实际上原本是第二性的，因为，他只不

① 《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2—43页。

过是人之自己成为自己对象的本质；因而，宗教认为是第二性的东西——人——，就应当被设定和表明为第一性的。对人的爱，决不会是派生的爱；它必须成为起源的爱。只有这样，爱才成为一种真正的、神圣的、可靠的威力。如果人的本质就是人所以认为的至高本质，那么，在实践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基则，也必须是对人的爱。对人来说，人就是上帝——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实践原则，就是世界史的枢轴。”^①从人本身去寻找人的本质，把宗教的、神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把宗教神学还原为人本学，在实践上用对人的爱代替对神的爱，这在宗教神学批判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费尔巴哈把自然看作是人的基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和一部分，这种自然主义哲学当然是唯物主义的，但他把人的关系仅仅看作是自然的关系，而不是社会关系，他认为理性、爱、意志，是人作为人的绝对本质，而爱应当成为人类关系的主导原则，这种非辩证的、非历史的人道主义学说是形而上学的，归根到底是唯心主义的。停留在“人就是人”的命题上，必然的结果就是“爱的宗教”，而不可能导致辩证的历史的社会学说。费尔巴哈的社会历史观之所以仍然具有唯心主义的性质，这是同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密切相关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逐渐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现象，同资产阶级思想家原来宣传的人道主义，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了这种矛盾，他们以对无产阶级的无限同情，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丑恶、野蛮现象，描述了工人悲惨和痛苦的生活，认为这是不人道的，是违反人性的，他们从善良的愿望出发，主张建立一个人道的，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还在资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0、315页。

产阶级为自己的胜利所陶醉的时候，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无情的批判，把资本主义文明世界所存在的根本缺陷、黑暗、弊病暴露在无产阶级面前，对无产阶级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所作的天堂般的描述，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他们诉诸人类的善良感情和愿望，而不是以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为依据，所以这种社会主义是空想的。

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曾经起过革命的作用，此后，它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也都起了不同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依其所表达的内容而定。有不少思想家、科学家、技术专家、文学家，他们毕生提倡人道主义，或者成为人道主义的实践者，为人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近代护理学和护士教育的创始人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公元1820—1910年），她虽然出身于一个英国富裕家庭，但她把一生都献给了护理工作。她看到来自贫民区的贫苦病人，入院时脏，住院时很脏，活着出院时还是很脏，医院成为一个可怕的地方，肮脏拥挤、管理不善、臭气熏天、杂乱无章。她对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病人寄以深切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并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尽可能使病人在治疗过程生活舒服，千方百计解除病人的痛苦。在病人面前，她镇静、友好、愉快，精心护理。对这样一位慈善、心地善良，长期为病人服务的护士，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特别是病人的“爱念”，病人称她是“我们的阳光”。象南丁格尔这样出于人道主义，终生为人类服务的人，在每个国家、每个历史时期都是有的，他们为人道主义而献身的精神，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丰富多采。对这样的人道主义者，给他们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是过于简单化了。对有些人来说，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道主义的论述，是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相联系的。在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对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成熟的马克思同人道主义的关系，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在评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我们先简述在马克思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著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就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所阐述的思想和摩塞尔河沿岸地区葡萄酒酿造者状况的考察，一直到对政治经济学和英、法两国阶级斗争的研究，才是马克思的思想成熟过程中的基本脉络。我们认为，如果说马克思是通过对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考察和研究，才逐步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才逐步摆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而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者 and 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那么，上述所说马克思思想成熟过程的“基本脉络”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从人道主义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那么，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在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对摩塞尔河沿岸地区葡萄酒酿造者状况进行考察时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同后来他对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等国阶级斗争状况的研究，以及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所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因而不能认为基本的思想脉络是一样的。

在关于莱茵省议会就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所写的论文中，马克思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无情地揭露普鲁士君主专制制度的反人道主义本质，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辩护。但是，这时的马克思基本上还是在黑格尔的影响之下，他谈论的

问题虽然关系到物质利益领域，但基本上还是从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出发的，他还把国家看作是理性的代表，是理念在政治领域的实现，它应该是代表人类利益、人类自由的机关。在这之前不久写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说：“最新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①从这种国家观出发，马克思指出在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莱茵省议会保护大小林木占有者的利益，而对森林违反者的利益，对捡枯树枝的贫民阶级的利益则置之不理。“省议会抹杀了捡枯枝、违反森林条例和盗窃林木三者之间的任何差别。在问题涉及条例违反者的利益时，它抹杀这些行为之间的差别，认为这些差别并不决定行为的性质。但是当问题一旦涉及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时，省议会就承认这些差别了。”^②马克思严厉斥责林木占有者力图使国家成为自己的利益的工具，甚至使国家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把林木占有者的奴仆变为国家权威的代表的这种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占有者的奴仆。整个国家制度和各种行政机构的作用都应该脱离常规，都应该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应该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③很显然，马克思是把国家成为普鲁士诸侯等级以及林木占有者的利益的工具这种现象，看作是脱离国家的常规的。总的来说，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论文，在维护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0页。